



科技巨头及当前阶级斗争面临的挑战



汇编46

三大洲社会研究所

2021年11月

科技巨头及当前阶级斗争面临的挑战





《云计算》作于 2021 年

数据云听着像一个空灵魔幻的所在，实际上完全相反。本期汇编的插图旨在形象地展现我们所处数字世界的物质性。我们把数据云投射到电路板上。我们用转基因专利来代表一种蔬菜。“开采”加密货币不是通过挖掘地壳，而是通过高耗能的计算过程来实现的。我们可以根据士兵的脚步声来绘制 GPS 坐标。用 1 和 0 的障眼法来编写代码。这些都提醒着我们，技术不是中立的，而是为掌控技术者的利益服务的。因此，技术是从属于阶级斗争的。

现代性难题是生活中既不能空想，又不能失去念想。

- 安东尼奥·葛兰西

“新冠冲击”这个术语特指病毒对于全世界的强烈影响。它指的是资产阶级国家在防控社会卫生灾难时的无能，而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秩序韧性则要强得多。

“新型数字技术”这一问题本身就是个挑战，在群众运动议题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除了获取技术的机会不均等以外，将数据用于压制、管控、消费主义、监视等问题也值得长期关注。与此同时，当今的大公司都是信息技术公司，因此新型数字技术对于理解当代资本主义趋势至关重要。以下术语概念已广为人知，从中不难看出我们在努力理解这些关切的问题：数字经济、数字资本主义、平台资本主义、技术封建主义、数据资本主义、监控型资本主义等。尽管我们对这些现象的理解尚无共识，但对立志改变世界的勇者来说，他们的挑战在于就数字数据和科技公司在当代资本主义中的作用作出客观的综合分析。

鉴于这一点，我们根据数字科技及阶级斗争研讨会的内容撰写了第46期汇编《科技巨头及当前阶级斗争面临的挑战》。该研讨会是无地农民运动组织（MST）发起的一个项目，旨在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的变化及其对我们组织斗争的启示，试图挖掘更深层次的内容，而不是数字安全问题或者社交媒体上的话语对立。这个知识建构过程主要是为了启发讨论，配合我们的运动研究数字技术与阶级斗争的相关问题。我们设法收集关于这一问题的不同见解，并进行反思以达成共识。这其中有研究人员和专家的分析，还有其他数字技术专业研究机构的知识库。

这种集体构建临时知识的过程产生了以下思考。其目的在于从阶级斗争的视角理解技术变革及其社会影响。此次研究并不会对就这些主题进行面面俱到的讨论并且盖棺定论，只是首次尝试去理解我们认为对当今社会组织至关重要的问题，借鉴了大量分析技术参与资本积累过程的著作。

技术与资本主义

在资本主义社会，技术是一种改变生产方式、分配方式、消费方式的特殊工具。技术既非中立，也不能脱离于社会制度。相反，它作用于由人类劳动创造的世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这种人类劳动以有产阶级的利润积累为中心。占主导地位意识形态说服我们，科学技术的发展是循序渐进且不可阻挡的，资本主义的出现是这一进程的巅峰，人类已拥有了一切生产均最优、最高效的制度，从而无视此前出现的一切以及至今仍拒不融入其中的一切。这种说法掩盖了一个事实，即技术是劳动的产物，是特定历史文化背景下社会关系及其动向的产物。

技术进步进程首先源自社会对劳动的组织动员。重大技术进步不是某些天才个人的功劳,而产生自集体知识和关切,与生命的生产再生产方式以及与这些方式互相依赖的社会关系有关。因此,资本主义社会经常产生体现其特性和矛盾的知识、技术、技能。它控制了现存世界,并试图塑造现实以满足自身需要。它打造了属于自己的产业和机器,对人类发展未必最有裨益,但对资本积累过程而言一定是最有效的。

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的组织以在逐利中剥削劳动为基础,它们试图利用自身技术来控制生产过程,支配人类劳动的节奏,使之成为资本主义机器上的又一零件。同时,资本所有者希望能统一、集中、支配生产能力,在相互间的长期竞争中占据优势,以便从其它经济部门攫取利润。其结果是,理论上可消费的产品越丰富,贫困现象也就越多。

由此可见,技术并不是中立的,因为它产生于对有产阶级而非其他人有利的阶级社会背景。信息通信技术(简称 ICT)是用技术表达了一个远比其广阔的进程。资本主义制度特有的周期性、结构性危机为新技术的出现创造了有利时机。随着微电子技术革命的兴起,微型芯片等集成电路的生产追求更小、更快,全球范围内的人际交流都受到了深刻影响和改变,同时使得资本流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公司能够同时在一系列国家拆除和设置工厂,通过信息化和标准化在全球范围内实时协调生产过程和金融交易。新技术使得生产过程和商品流通有可能外包,工人阶级可能发生分化,表现为劳动弹性和权利撤销。资本具有转移生产的能力,议价权进一步高于工人;而在此之前,工人被集中管理在同一地点的大型厂区。



《全球定位系统的起源》作于 2021 年

科技巨头与国家

基于微电子和计算技术发展的信息通信技术原本主要是出于军事优先考量，后来因为资本积累扩张的需要才延伸至民用部门。为了提高军事实力，美国动员、协调、支持政府机构、高校、私营企业进行合作。冷战期间的太空竞赛也推动了技术进步，如今仍在持续的太空探索也是如此。

在催生新市场的技术研发方面，在为了维持甚至争夺新细分市场、促进外部市场扩张而推进技术前沿方面，国家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高科技公司与国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体制上依赖于国家推动的创新制度，而这些制度一开始的核心目标就与军事有关。信息通信技术产业是在北方国家及企业的控制下建立的。总体而言，跨国公司仍主导了与控制、发展基础技术有关的生产过程和高附加值产品，既可保证高利润回报，又可利用军事和监控技术的进展，谋求巩固霸权。

因此，要理解谷歌、苹果、脸书、亚马逊、微软等大型科技公司（统称“科技巨头”）的崛起，必须先弄清它们与资本积累机制的关系。尽管这些公司自诩为当前各种经济问题的“解决方案”，但它们本身其实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也就是说，它们体现了危机下的资本主义利用技术服务自身利益的企图。就规模和内涵而言，这些公司运用的技术处于前沿，但它们又在很多方面体现了文明的倒退，例如：给劳动赋予弹性、撤销权利、肆意破坏自然资源、资本集中集聚、私营企业霸占公共空间等资本主义解决自身危机的种种典型做法。

作为当代资本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科技巨头的崛起伴随着以个人主义、企业家话术、否定政治的中立话术等社会思潮为根基的重大思想攻势。由于这类公司在社会中承担了媒体和强势思想媒介的作用，这些社会思潮的影响力日益增强。其中一个基本论调认为“虚拟世界”是一种平行现实，以网络空间、地球村、虚拟世界、万维网、信息高速公路、元宇宙等多种形式呈现，它们都基于一

个假象：在一个具有横向特性的网络里，在取得同样工具的前提下，所有个体都是平等的。他们享有话语权，可以参与并影响集体生活。在这个虚拟世界里，网络和技术是中立的。正如科技巨头的口号所说，其目的只是“创造解决方案，连结人人”。然而，造成这种水平均等表象的是那些擅长向公众宣扬特定政治主张的公关高手，以及越来越多的数据分析师和科学家。他们必须竭力让我们无法认清现实，比如大多数人面临的数字鸿沟和空闲时间被侵蚀的现实。

“云”这个词被频繁使用，印证了所谓抽象空间的说法，用户产生的数据在这里得到永久保存并按照普遍适用的标准、以近乎神奇的方式加以组织。然而，事实远非如此。“云”实际上是一个庞大且极为具象的多重技术基础设施。它由一套高度集中、高度垄断的服务器组成，主要存储在美国的设施中，在那里，放松监管和政治利益、盈利诉求的专断凌驾于对用户数据的民主或普适性主张之上。此外，这种装置还耗费了大量能源和自然资源。与此类似，“人工智能”也是一个常用术语，指用复杂的数学运算来分析和处理大量数据的软件。它暗含着中立的理念，表面看来是机器自主“思考”并做决定的，但实际上，使其运行的软件中存在技术开发主体的偏见。

科技巨头的另一大神话是企业家的传奇。白手起家的古老传说有了全新版本，认为成功只靠个人奋斗和能力。这个神话塑造了以车库为家的天才形象，通常是白人男青年，他们依靠自身努力改变世界，凭一己之力成为亿万富翁。史蒂芬·乔布斯、比尔·盖茨、马克·扎克伯格等人成为了商业领袖、心灵导师，似乎只要有想法、有毅力，任何人都能走上他们那样的人生历程。然而故事中并没有提到这些企业家都曾就读于哈佛、斯坦福、普林斯顿、麻省理工、加州理工等顶尖精英学府。这些大学表面上属于私立性质，但都依赖大量公共投入、重大公共政策、政府军民部门的资金，以及从边缘国家知名学府引进人才和知识的政策。

“数字企业家”论调也掩盖了信息通信技术与金融资本、投机资本的关系，

后者会投入数百万美元创建、拓展这些公司。他们兜售“白手起家”的个人形象，而不提这些企业家早已获得百万级资金的事实，这些资金归根结底来自私人占用公共知识技术的所得，这些知识技术又是利用大量公共资源进行公共开发的结果。扎克伯格创建脸书之所以能得到 50 万美元资金，正是因为他与精英金融投机资本关系密切。

同样耐人寻味的是，思播、优步等一众企业并无盈利，也未必需要盈利。它们的市场价值已变得比盈利能力更重要，哪怕是一种预估的价值预期就足够了。这种金融化现象有其物质基础：剥削劳动力。技术提高了工人的生产效率，技术融入了机器和工具（用马克思的话叫做“不变资本”），机器和工具又将其蕴含的价值传递给了新创造的商品。经济的金融化程度越高，生产部门的压力就越大，工人受剥削的程度也就越高，这样才能抵偿在股市上投机的巨额资本。



《加密货币挖矿》作于 2021 年

金融化

金融资本与信息通信技术结合的路径不仅仅是为科技企业注资乃至持有它们。新自由主义特有的金融监管缺失，加上智能手机可接入网络的选择催生了金融科技公司。这种公司主要研发数字金融产品，专注于创建数字支付平台、实施线上交易，让数十亿“没有银行账户”的人嵌入金融体系。

世界银行估算，全球有 17 亿人没有银行账户，大多是农村人口。例如，拉丁美洲有五到七成人口无法使用银行服务。而并非巧合的是，近年来，该地区金融企业的规模增加了两倍。在这 17 亿没有银行账户的人群中，11 亿拥有手机¹。随着金融科技的发展，银行账户、固定住址、收入门槛、付费服务就不再是必需的，只需要有手机、能上网，这意味着大部分弱势群体将被纳入体系。

中国金融科技企业也在参与边缘国家银行市场的竞争。华为与非洲本土运营商合作，在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开展安全服务、贷款、汇款、甚至丧葬保险业务。亿万富豪、北京昆仑万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周亚辉在肯尼亚投资了一个手机贷款平台。非洲最大手机零售商是总部位于深圳的传音，它也在尼日利亚和加纳投资了一个平台。阿里巴巴集团旗下的支付宝在南非开发了一个“超级应用程序”²。信息通信技术与金融资本在零售领域也进行了通力合作。2003 年非典爆发时，随着阿里巴巴、腾讯等当今零售业巨头的崛起，电子商务飞速发展。

而在新冠疫情爆发前，由于贫困率高、银行和网络使用率低，拉丁美洲成为了电子商务普及率最低的一个地区。正因为如此，美国高盛银行表示，新冠疫情可能会使得拉美重演 21 世纪初中国的电子商务热潮。非典疫情期间，中国的电子商务蓬勃发展，网络销售平台开始兴起。阿里巴巴已经成为了当今全球最大的零售商之一。中国人越来越多地在网上购物。高盛预测，拉美的电子商务发展也会呈现同样趋势。对此，研究员拉里萨·帕克在本次研讨会的文稿中强调，2020 年拉丁美洲的在线交易量和新在线消费者人数增加了 50%；并表示，该地区食品相关行业在线零售商的月收入从 1900 万美元跃升至 1.2 亿美元，增长了 500%。例如，哥伦比亚外送平台 Rappi 在短短六个月内规模就翻了一番。



《基因专利》作于 2021 年

科技巨头对抗自然

新冠冲击一方面限制了人和商品的流动, 并由于商品进出口问题, 造成了全球价值链的断裂; 另一方面它又加速了数字化需求。新冠冲击还促使城市工业、采掘业、农业领域的基础产业及生产分配方式采用科技。它也促使工作时间和非工作时间、生产劳动和再生产劳动、劳动空间和休闲空间之间的区分变得不再明显。

在农商经营中, 农业巨头、科技巨头、金融科技公司间的合并、收购、交易有所增长。新的基础架构导致参与者重组, 长此以往, 又会造成寡头垄断。这种重组又增加了农商经营链各个阶段大量采集数据的需求。此外, 通过增加公共信息获取难度、增加私人平台供应、增加科技巨头的公共服务配套设施, 使得公共服务风险加剧。这显然会干扰各国政府的自主决策能力。

约翰迪尔、博世是拖拉机和机械领域的霸主, 嘉吉、阿彻丹尼尔斯、路易达孚、邦吉则主导了物流、销售领域。此外还有沃尔玛、阿里巴巴、亚马逊等大型零售商。

科技巨头意图进军农业部门, 采用垂直整合的方法, 并非整合同一个行业的公司, 而是沿着价值链进行整合, 表明科技巨头有能力吸收、重组从该领域到消费者的垂直链条。在全球数字化趋势中, 自然景观和资源领域和基因测序领域一样大势所趋。例如, 微软正与全球的种质资源中心合作, 提供基础设施, 促进基因库数字化。2018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会议启动了亚马逊数据库项目, 旨在对地球上的种子、幼苗、动物、各种单细胞生物的基因测序信息进行分类、赋予专利。这只是地球代码库计划的第一步³。

一个具有殖民主义特征的寡头垄断市场正在形成。主要来自北方国家的跨国公司获得专利和知识产权，榨取南方国家低廉的原材料，以此长期投资科学技术。此外，技术飞跃也意味着锂、铁、铜、稀土金属等矿物能源原料的需求增大，为了保障供给，国际劳动分工在组织上日趋强势。例如，2019年玻利维亚政变的直接原因是该国将其名列世界前茅的锂储量国有化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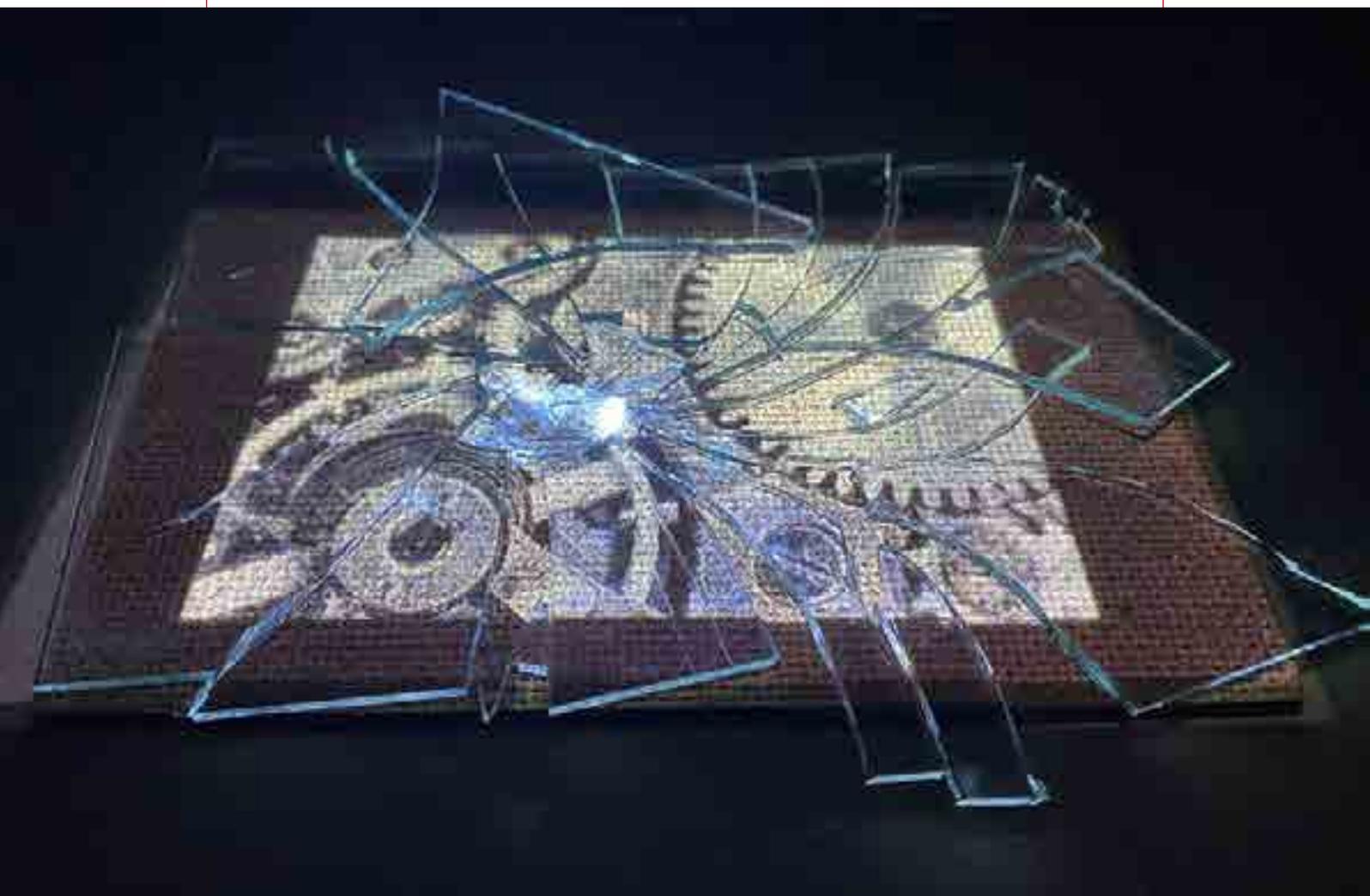
农村基建部门也在重组。近五年来，先正达、拜耳、巴斯夫等公司研发了可在手机上安装的农业软件和数字平台，为生产者提供农业方面的建议。如今，搭载了人工智能技术的拖拉机可以收集土壤湿度、成分、最佳种植位置、最佳种植季节等信息，农民也可以用手机输入自己的数据。收集数据本身并不困难，换一种社会制度，数据是有助于农民作业的。但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公司控制数据只为盈利。这些公司只拥有软件不拥有硬件，硬件掌握在约翰迪尔、博世等正在开发人工智能、机器人的巨头手中。体现这一结果的是机器人拖拉机、传感器、无人机等。

农商巨头产生的专利和信息必须存储在科技巨头的数字基建中。微软有 Azure 云，苹果开发了针对精准农业的 Apple Watch，并为农民创建了 Resolution 应用程序；亚马逊在其面向农村地区的亚马逊网页服务上设置了存储功能；脸书正在为农民创建一个数字咨询应用程序；谷歌为联合国粮农组织创建了机构版的谷歌地球；等等。这些服务的主要用户是商品进口市场上的大型农业生产商；而与此同时，5亿农户无从获取这一系列的新技术。他们有的只是手机，通过其他农户在短信或 WhatsApp 随意发送的信息接受农艺指导。小农户可以“随意”使用大量应用程序，交换条件就是要参与大规模数据采集。

因此就出现了金融科技公司、科技巨头、农业巨头的整合问题。隶属于欧洲电讯巨头沃达丰的肯尼亚阿瑞福 (Arifu) 公司通过短信、WhatsApp 提供农业咨询服务。阿瑞福与先正达、数字农场 (DigFarm) 合作，在提高先正达种子知名度的同时，也助力数字农场向肯尼亚农民提供小额信贷。这种整合可以通过

数字平台结构实现。平台收取少量费用，出售数据，并允许使用数字货币⁵。但人工智能和算法怎么能“读取”具有多样化本地种子的小农户土地以达到其目的，比如方便企业提供免费咨询呢？这种技术的本意就是为了大片土地和单一型耕种。将小农户纳入体系的手段，不是打包出售技术，而是小额信贷和与金融科技催生的平台相伴而生的数字货币。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就必须减少国家对经济和农业的监管。

最近的印度就见证了这一趋势。2021年1月至2月，印度百万农民进驻新德里，要求废除将终结国家农产品市场监管的三项法律。根据这些新法律，国家将不再确保农民的产品获得公道价格，而且要开放市场、取消市场监管，这就使得零售巨头和技术巨头取代乃至淘汰小商户。这在实践中就意味着这些大公司将在该行业组织生产消费⁶。



《工作的分裂》2021年

科技与工作

数字经济加上金融化，使得工作领域发生变革。在科技巨头时代，形容工作风险的词汇包括“优步模式”、“工作平台化”、“零工经济”，由于优步司机、平台外送司机的聚集，此类话题的研究也获得关注。无论这些词汇有何含义，起决定作用的并非技术，而是这几十年来趋势，劳动者在此过程中转变为服务提供者，处于脆弱的、长期动荡的劳动关系。

社会学家路德米拉·阿比里奥 (Ludmila Abilio) 在 2019 年指出，此类变化需从边缘群体的视角探讨。其历来处于不平等地位，通过伸张劳动权利以获取正式工作的方式从未成为常态。恰恰相反，他们生活的基本面是长期失衡的正式劳动关系和非正式劳动关系、自由职业、一些不被当作工作的活动。如此情况下，谈论风险和弹性工作意义何在？

所谓“优步模式”可以理解为边缘人群生活方式决定因素的全球化。这些公司已经改变了其他社会阶层，重组了中产阶级、白人男女的生活，最后再延伸至北方国家。这些因素构造、形成了资本眼中的边缘群体，这一现实在该群体中绝非偶然。然而，时至今日，非正规工作、弹性工作倒是史无前例地成了普遍情况。

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这一进程正在不断深化，通过子公司和外包的方式将生产分散，意在将劳动控管形式变得较难辨识。国际寡头垄断公司逐渐掌控了非正规工作，组织、管理、决定了工作的内容。在本应中立的算法管理领域中不存在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工作用具。所有风险和成本都转嫁到劳动者身上，他们用自有物品、房屋、车辆、缝纫机、鞋垫等进行“从属型自我经营”，受到一套机制的集中控制；这套机制看似模糊，却在非正规工人的合理化管理上极为有效。

然而，若没有数字劳动参与，这种向近乎完全自动化迈进的大胆策略是无法实现的；也就是说，生产人工智能甚至生产数据需要隐形的人类劳动，如挖矿、

清理、格式化等。南方国家有成千上万的人在为北方国家的大企业工作，训练机器执行任务却只得到低于贫困线的工资⁷。

路德米拉·阿比里奥在 2019 年总结道，准时制生产模式已然胜出，现在正日益巩固。如今的技术进步使得资本家得以管理始终任其支配的劳动力，后者只在需要时为其工作。或许，商品分配阶段的劳动者所经历的战时工作状态可以为反抗当代工作中新型剥削压迫统治的新方式提供思路。

两个大国的技术较量

要想理解科技巨头的崛起，我们必须认识到，科技劳动力是在全球范围内得到组织的，这一组织过程将技术知识生产的战略阶段集中在核心国家，而边缘地区则只能充当技术的消费者。核心国家和边缘国家间的对比令人震惊：2015 年，北美、欧盟、中国、日本、韩国等国占全球公共和私人研发支出的 82%，30 个左右的国家就控制了全球几乎所有的科技生产。当年轻美国一国的开支就达到 5020 亿美元，占全球支出的 26%⁸。

中国在信息技术领域也取得了重大进展。拓展该领域的基建、知识、生产是中国巩固其全球大国地位的一项举措。此外，中国还力图维护涉及国际监控体系的主权和国防，防止本国数据经由他国。中国的技术进步引发了美国及其盟友的反应，这尤其是因为，5G 落地使全球电信基础设施升级，信息通信技术行业将迎来质的飞跃⁹。新技术使得数据传送接收量增大，速度比 4G 快大概 20 倍。如此流量和速度将影响数据存用量大的领域，如自动驾驶汽车甚至是娱乐业，只需几秒即可在手机上观看高清影片。这种技术升级为技术公司乃至国民经济在整个工业体系中的重新定位提供了机会。

尽管中国的国家实力使其成为首个大规模应用 5G 商用网络的国家，但中国对美国集成电路产品和技术直接、间接依赖成为美国用以拖延甚至阻碍中国发展的痛点。美国在尖端半导体及其制造机的生产方面，在该领域技术前沿进步方面均居于核心地位，有能力干预全球生产网络，动用一些手段阻碍中国信息通信技术发展，而中国极其依赖这些核心部件¹⁰。信息通信技术的生态系统高度全球化且错综复杂，加上中国市场具有中心地位，这不免有损美国的资本主义利益。用经济学教授埃斯特·马耶罗维茨 (Esther Majerowicz) 的话来说，这呈现出一种“既竞争又互补的多样化矛盾格局，挑战了美国对互补优先领域的打压策略。”¹¹ 华为是唯一可为大规模搭建 5G 网络提供大批必要设备的公司，封杀华为（美国也这么做了）将使不具备基建能力、在电信设备市场上缺乏竞争力的国家在其他各类市场上处于不利地位，在人工智能发展所需的特定数据群生产方面处于落后地位¹²。

正如我们所见，全球电信基础设施的升级改造为各国在整个工业体系中未来的重新定位创造了机会。5G 网络延伸到资本主义世界之外那些通常不具备基建能力的边缘国家，这将导致它们对技术和金融依赖增大，也将导致国际监视系统扩大¹³。大国之间、发达经济体之间争夺的领域就包括为边缘国家搭建 5G 提供财援。没有自主发展计划，边缘国家只能遵循为大国、发达国家的利益和目标而设计的发展模式。



《连结的电缆》2021 年

起点

群众运动、组织、集体的主要挑战是打破关于数据经济的霸权思想话语体系。必须将数字经济视为当代资本主义的核心因素来分析；当代资本主义正企图巩固其扩张的基本条件，这些条件包括：

自由的数据市场：一方面，用户数据被随意收集使用，但在科技公司却并不是反之亦然，因为它们使用的数据、指标、算法都有专属权并被严密保管的。与此同时，用户数据的产量前所未有的，已成为商品和金融资产，为了确保企业利润，必须不受监管和控制地流通，而不考虑数据产生者用户的利益。

经济金融化：数据资本主义公司是依靠流动的投机资本发展壮大的。这些公司见证了资本外逃，将资本从生产部门转到投机部门。生产部门的压力因此愈来愈大，剥削、风险加剧。

权利沦为商品：科技巨头及其衍生公司推广其提供的技术“解决方案”，连公共服务都难以幸免。政府与科技巨头签订了数百万美元的合同。凭借所谓高效先进的说辞，教育权、健康权、交通权等权利沦为商品。普通民众无法企及的算法和利益同时影响了一部分大众生活，因为大量资金转向了科技公司。

公共空间减少：个人至上的社会用所谓“个性化内容”将个人分隔为自我满足的利益泡沫；这种社会观念的传播依然畅行无阻。所谓的参与诉求阻碍了依据不同意见和客观数据的公共讨论，目的在于借提供反馈、重申个人作用牺牲集体乃至普遍意见。

资源、生产链、基础设施集中：数字经济最有利可图的层面需要高度的集中化。资源、生产链、基础设施集中在少数大公司手中，这对当今资本主义而已显然是不可或缺的，即便其运作是由子公司及各种企业、服务机构完成的。这些公司手握大权，无视有关政治、经济、环境、种族等问题的大众民主讨论。

这些特征并非所谓数字经济所独有，而是更广泛的资本主义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技术进步无法在其嵌入的社会组织中自动产生。理解这种关系的一大关键在于，要清楚资本主义的一个基本特征：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倘若技术是一种公共产品，而非少数人促进资本利益的资本，就可以在确保充分生产以满足人类需求的同时大幅减少工作时间，让我们拥有自由时间，更游刃有余地去实现人的价值。

一旦理解了数字经济做大做强资本主义的用意，寻求新道路的运动、组织、群众团体就有了一个挑战。我们必须审视自己的组织并思考其中的某些挑战。获取技术资源和信息本身并不能减少不平等现象，实际上甚至会加重不平等。利用“智能”设备的行动、政策并非都是智能的行动、政策。必须时刻牢记，技术是各种矛盾的载者，既可能带来解放，也可能造成异化，在受到阶级斗争影响的社会中永远存在争议。劳动者要真正有效地运用技术，就必须始终紧密联系阶级斗争的战略战术。我们也不能在**分析和实践中**混淆其因果。电子监视（无论针对个人还是群体）、假新闻、仇恨言论和反民主论调的传播、应用程序导致的就业风险，都体现了一种更为深层的经济逻辑。为了根据**行动方向和方法**调整我们的力量，这场讨论对于我们尤为重要，无论是近期中期还是长期。

我们不允许自己患上奢侈的技术恐惧症，也不要否定技术的重要性及其在阶级斗争中的潜力。同时，我们不能相信“技术本身能推动有组织的工人阶级进步”这一观点。技术进步并非从其所嵌入的社会组织形式中自动产生；阶级斗争的理念将指引我们利用科学知识、构建切实可行的替代技术。关于数字技术与资本主义的辩论不能成为一个由关注该话题的个人或小团体推动的小众辩论。鉴于该问题对经济、政治、地缘政治、教育、文化、组织、动员、斗争的影响，它必须是一场方方面面、各类组织参与的辩论。只有通过更广泛的、集体的参与式辩论，我们才能从社会主义视角重新定义技术“解决方案”和“效率”的条件。





《障眼法》2021年

尾注

- 1 Grain, 'Controle digital', 2021.
- 2 详情请关注东声编辑部 (Dongsheng Collective) 旗下的“News on China”每周新闻总结: <https://dongshengnews.org/en/>
- 3 Schmidlehne, 'Blockchain e contratos inteligentes', 2020.
- 4 Prashad, 'Bolivia's lithium', 2019.
- 5 Grain, 'Controle digital', 2021.
- 6 Tricontinental, 'The Farmers' Revolt', 2021.
- 7 DigiLabour, 'Uma Internet alternativa', 2019a; DigiLabour, 'A Invisibilidade do Trabalho de Dados', 2019b.
- 8 Moura, 'Ensayo sobre la ceguera', 2018.
- 9 Tricontinental, 'Twilight', 2021.
- 10 Majerowicz, 'A China e a Economia Política Internacional', 2020.
- 11 Majerowicz, 'A China e a Economia Política Internacional', 2020
- 12 Majerowicz, 'A China e a Economia Política Internacional', 2020
- 13 Majerowicz, 'A China e a Economia Política Internacional', 2020

延伸阅读

Abilio, L. C. 'Uberização: Do empreendedorismo para o autogerenciamento subordinado.' *Psicoperspectivas* 18, no. 3 (2019). <http://dx.doi.org/10.5027/psicoperspectivas-vol18-issue3-fulltext-1674>.

DigiLabour. 'Uma Internet alternativa deve combinar serviço público e cooperativas de plataforma: entrevista com Christian Fuchs.' DigiLabour, September 2019a, <https://digilabour.com.br/2019/09/13/christian-fuchs-internet-alternativa-trabalho-digital/>.

DigiLabour. 'A Invisibilidade do Trabalho de Dados: entrevista com Jérôme Denis', DigiLabour, March 2019b. <https://digilabour.com.br/2019/03/27/o-trabalho-invisivel-de-dados-entrevista-com-jerome-denis/>

Grain. 'Digital control: How Big Tech moves into food and farming (and what it means)'. *GRAIN*, 21 January 2021. <https://grain.org/en/article/6595-digital-control-how-big-tech-moves-into-food-and-farming-and-what-it-means>.

Majerowicz, E. 'China and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Geosul* 35, no. 77 (December 2020): 73-102. <https://periodicos.ufsc.br/index.php/geosul/article/view/77503>.

Moura, B. D. 'Ensayo sobre la ceguera: la industria 4.0 en América Latina'. *Hemisferio Izquierdo*, 20 June 2018. <https://www.hemisferioizquierdo.uy/single-post/2018/06/17/ensayo-sobre-la-ceguera-la-industria-40-en-am%C3%A9rica-latina>.

Prashad, Vijay. 'Bolivia's lithium and the urgency of a coup'. Brasil de Fato, 12 November 2019. <https://www.brasildefato.com.br/2019/11/12/article-or-bolivias-lithium-and-the-urgency-of-a-coup>.

Schmidlehne, Michael F. 'Blockchain e contratos inteligentes: as mais recentes tentativas do capital de se apropriar da vida na Terra'. World Rainforest Movement, no. 247 (January 2020). <https://wrm.org.uy/pt/artigos-do-boletim-do-wrm/secao1/blockchain-e-contratos-inteligentes-as-mais-recentes-tentativas-do-capital-de-se-apropriar-da-vida-na-terra/>.

Tricontinental: Institute for Social Research. CoronaShock: A Virus and the World. 5 May 2020. <https://thetricontinental.org/dossier-28-coronavirus/>.

Tricontinental: Institute for Social Research. 'The Farmers' Revolt in India. 14 June 2021. <https://thetricontinental.org/dossier-41-india-agriculture/>.

Tricontinental: Institute for Social Research. Twilight: The Erosion of US Control and the Multipolar Future. 4 January 2021. <https://thetricontinental.org/dossier-36-twilight/>.



三大洲社会研究所

是一个国际性的研究机构，发轫于人民运动中，为知识分子间的观点交锋搭建平台，并以倾力于实现人民的愿景为宗旨。

www.thetricontinental.org